

雅各布森《夏洛克是我的名字》 中的当代犹太人形象

田俊武 侯丽娜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191)

摘要:四百年前,英国文豪莎士比亚曾为后人留下一篇《威尼斯商人》和一个名为夏洛克的经典吝啬鬼文学形象。四百年之后,英国犹太小说家霍华德·雅各布森对前人之作进行了新锐改写,在自己的新作《夏洛克是我的名字》中,向读者展示了穿越四百年而来的夏洛克的另一种面貌,探讨了犹太人在当代英国的生存现状。作为《威尼斯商人》的当代戏仿作品,《夏洛克是我的名字》自然与原作在体裁上具有明显的不同,但是两文本间始终存在着明显的互文关系。本文从文本形式的互文、新话语世界的创造以及前驱者的影响这三个角度来分析《夏洛克是我的名字》与《威尼斯商人》两者之间复杂的互文性关系,以便窥探霍华德如何通过戏仿莎剧来为犹太人这一边缘群体“发声”,同时研究当代改写作品与经典作品之间所存在的传承与超越这一矛盾关系。

关键词:《威尼斯商人》;《夏洛克是我的名字》;互文性;戏仿;改写理论

中图分类号:I561.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0)01-0050-08

0 引言

2015年,英国霍加斯出版社发起“霍加斯·莎士比亚系列”大型出版项目,邀请当代世界名家改写莎翁经典剧作,赋予经典新意,重燃公众对莎翁经典作品的热情,以此向莎翁致敬。霍华德·雅各布森(Howard Jacobson)于2016年推出的对《威尼斯商人》的改写之作《夏洛克是我的名字》(*Shylock is My Name*),便是这一项目的主要成果之一。《英国卫报》《每日邮报》《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各大媒体对此纷纷盛赞,例如《英国独立报》书评人鲁卡斯特·米勒称此书“超高水准的重写,透彻而戳动人心……夏洛克在这里是一个能够唤起你我同情心的人物”(Miller, 2016)。批评家史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也给予本书高度评价:“在我看来,雅各布森对《威尼斯商人》的重写以及他对这部作品的洞见似乎表明两者有着命中注定的缘分。”(Hoare, 2018)然而,尽管媒体对霍华德的这部改写之作好评如潮,却鲜有学者深入地对这两部作品做过比较性研究。借助互文性理论,本文试图揭示霍华德的《夏洛克是我的名字》在主题和叙事情节方面对莎翁的《威尼斯商人》的继承、变异和超越。

1 《夏洛克是我的名字》与《威尼斯商人》的互文性呈现

朱莉亚·克里斯蒂娃指出:“任何作品的文本都是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Kristeva, 1986: 37)身为一代文豪,莎士比亚一生中的大部分作品都不是他的原创,而是吸纳并改写了前辈文本中的情节或创意,《威尼斯商人》也不例外。如今,轮到他的戏剧被后人进行改写了。《夏洛克是我的名字》讲述一位当代犹太人的故事。西蒙·斯特鲁洛维奇是一位富有而吝

收稿日期:2019-07-26

基金项目: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才拔尖项目“西方旅行文学与中国形象表征”(ZG226S189J)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田俊武,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美富布赖特学者,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侯丽娜,女,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裔的犹太裔艺术品经销商,有一次在祭拜母亲时偶遇来自莎翁戏剧中的犹太富商夏洛克,并邀请对方到家里做客。不料他的生活因为一个来自四百年前莎翁剧作中人物的介入,发生了一系列的变故,连他最珍视的女儿也跟着一名劣迹斑斑的球员私奔。故事中,夏洛克作为一个冷酷而理智的旁观者形象,成为事态发展的见证者甚至是推动者。《威尼斯商人》中以自己一磅肉做抵押借钱给好友并几乎丧命的安东尼奥,在《夏洛克是我的名字》中的对应人物则是一位乐善好施的现代人德·安东,他也愿意为了亲密好友去牺牲自己,最终同意让斯特鲁洛维奇取走现代意义上的“一磅肉”——施行割礼。在斯特鲁洛维奇看来,割礼便意味着从基督徒到犹太人的转变。就在此时,一封来自医生的信件告知德·安东,说他幼年时便已完成割礼手术,他已经失去了那“一磅肉”,从生理意义上讲他与夏洛克、斯特鲁洛维奇无异。与《威尼斯商人》中安东尼奥被扮作律师的鲍西亚拯救而免于被割去一磅肉相比,这一幕实在颇具讽刺意味。

马格利特·罗斯说过:“无论何时,只要我们识别出两个或更多文本间的关系,或者认识到具体文本与文类、流派或时代等隶属更宽范畴的类别之间的关系,那么互文空间就已形成。”(Rose, 1993:203)霍华德的《夏洛克是我的名字》与《威尼斯商人》之间也存在着一种互文空间。霍华德曾声称《夏洛克是我的名字》是《威尼斯商人》这部作品的“产物”,而且也是他对《威尼斯商人》的评论。“我希望我的小说一方面是关于《威尼斯商人》的重新讲述,另一方面则是一篇关于这个故事的论文——当然是非常微不足道的论文。与此同时,我也在小说中添加了一些与剧本解读相关的批判性思考。”(傅适野, 2017)这些文本仿佛被一条隐形的线绳穿连起来,跨越时空,形成一种互文性对话。然而,每一次对原文本的重写,在某种意义上都象征着原文本在当代的重生。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由荷马史诗《奥德赛》改写而来,唐纳德·巴塞尔姆的《白雪》也是改写自格林童话《白雪公主》,但是,这些改写之作不再是原作的附属寄生,而是已经成为后现代小说的经典。同样,《夏洛克是我的名字》出版之后广受好评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也处处流露着作者睿智的思想。

《夏洛克是我的名字》与《威尼斯商人》中的互文性关系首先表现在后者是从前者派生出来的,是经过转换和模仿的超文本。热奈特指出:“一切文本均是将自身刻于先文本之上的超文本,它与先文本之间既有模仿,又有超越。”(Genette, 1997:ix)热奈特所指的“超文性”就是一个文本通过转换和模仿从另一个文本中派生出来,并且先前的文本总是或多或少的被派生出来的超文本所引用。在《夏洛克是我的名字》这一超文本中,处处体现着热奈特狭义的“互文性”概念,即一个文本在另一个文本中反复出现。为了避免小说陷入庸常,霍华德承认自己需要大量阅读莎士比亚作品来保证莎士比亚的“声音”充满自己的脑海。他说:“我希望莎士比亚作品中的句子出现在我小说里的各个地方……要用一些偶然的隐喻、典故和描述,来呼应莎士比亚的世界。书中有来自《威尼斯商人》的,也有来自很多其他作品的引用。”(傅适野, 2017)的确,《夏洛克是我的名字》从题目、主要人物设置到情节模式都明显脱胎于《威尼斯商人》。尽管《夏洛克是我的名字》的故事发生在当代英国语境下,人物设置以及主题延伸等与《威尼斯商人》相比也有着较大变动,但两者之间传承与发展的互文性关系依然明晰可辨。

互文性最直接的体现是对原文本的引用。首先,“夏洛克是我的名字”这一题目出自《威尼斯商人》第四幕第一场法庭判决之前,鲍西亚在分辨安东尼奥和夏洛克时问道:“你的名字就叫夏洛克吗?”夏洛克回复道:“夏洛克是我的名字。”这一题目明确表明这部小说发轫于莎剧,并且故事主角便是那个曾被冠以贪婪残忍的恶魔之称的犹太富商夏洛克。整体统计显示,《夏洛克是我的名字》直接引用《威尼斯商人》中的原台词多达 20 余处,遑论那些在行文中隐藏颇深的间接引用或改写自《哈姆雷特》《第十二夜》等其他莎剧作品中的话语。其次,《夏洛克是我的名字》在很大程度上沿用了莎翁原剧的人物设置和情节模式。霍华德使用现代的背景、新锐而贴近现代人思维的视角,为经典故事搭建新的纸上舞台。他将故事场景从威尼斯转移到了当代英国的曼彻斯特,鲍西亚所在的超然世外的贝尔蒙特也成了曼彻斯特的

富人聚集区——柴郡,而这里同时也是犹太人聚集区。小说的主角斯特鲁洛维奇,当代的“夏洛克”,是一位品味高雅的犹太裔艺术品经销商;而与夏洛克关系剑拔弩张的安东尼奥,在这部小说里则对应的是一位具有同性恋倾向的德·安东,他同时也是富有的普鲁拉贝尔——当代鲍西亚的闺中密友。原作中向安东尼奥借钱追求鲍西亚的巴萨尼奥在这里变成了巴纳比,同样为了得到普鲁拉贝尔而寻求德·安东的帮助。斯特鲁洛维奇的女儿比阿特丽斯,像杰西卡跟罗兰佐私奔一样,同样跟一位非犹太人——劣迹斑斑的球员葛兰顿一起逃离犹太父亲的家。

表1 《威尼斯商人》与《夏洛克是我的名字》人物照应关系

《威尼斯商人》	《夏洛克是我的名字》
夏洛克	夏洛克
	西蒙·斯特鲁洛维奇
杰西卡	比阿特丽斯
鲍西亚	普鲁拉贝尔
安东尼奥	德·安东
巴萨尼奥	巴纳比
罗兰佐	葛兰顿·豪色姆

小说中的人物关系及其背后的故事情节,将为人熟知的莎剧经典陌生化的同时又巧妙地借取原作,安抚了人们阅读经典的畏难情绪,为广大读者走进莎翁的文学世界提供了一个绝妙机会,并不断提醒读者将两部作品联系起来,从而实现了霍华德与莎翁之间的对话以及这两部作品之间的对话,也实现了当代社会语境与莎翁所处时代的社会语境之间的对话。可以说,互文性空间的存在使这两位作者、两部作品、两个社会语境同时在场,互相配合又互相冲突,最终达到反思现实和批判现实的目的。

2 《夏洛克是我的名字》对《威尼斯商人》的再创作

霍华德并没有简单复制《威尼斯商人》的人物,而是结合情境对原剧人物进行了再创作。最夺人眼球的便是从莎翁戏剧中走出来的夏洛克的持续在场,他自然而然地出现让这部小说不同于其他的改写作,为这部作品带来了独特的生机。另外,《夏洛克是我的名字》中斯特鲁洛维奇要求德·安东行割礼、普鲁拉贝尔跟巴纳比之间荒谬的爱情、比阿特丽斯跟葛兰顿被迫出走分别与《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跟安东尼奥的契约中言明的“一磅肉”、鲍西亚要求巴萨尼奥挑选“三个匣子”以及杰西卡跟罗兰佐私奔并皈依基督教的情节主线大致上保持平行。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些平行的情节发展脉络里,霍华德将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发挥到极致,为小说的叙述加入了新鲜的当代血液。在当代英国场景中,虽然原作中那些对犹太人直截了当的侮辱和责难在当代“文明社会”中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带有犹太特色的粗俗无礼的冷笑话以及对犹太民族光辉文化的漠视。更为出彩也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作者将最初“一磅肉”的契约解读为夏洛克想要为德·安东施行割礼以及夏洛克在小说结尾时发表的曾出自鲍西亚之口的关于“慈悲”的演说。这种将对立性、差异性寓于相似性之中的互文在读者原本熟悉的认知背景之上实现了陌生化的审美效果,在为作品增添现代社会的荒谬与幽默的同时,也能够更大程度地引起读者对作品更为深刻的思考。

相比原剧中的鲍西亚、安东尼奥、巴萨尼奥等人,夏洛克无疑是一个更受评论家和文学家青睐的人物。多年来,《威尼斯商人》不断被搬上舞台和荧幕,夏洛克背后的人性也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被展示出来,赚足了观众的同情,很多演员也以出演夏洛克这一角色为骄傲并以此证明自己的表演实力。另一方面,包括詹姆斯·夏皮罗(James Shapiro)和史蒂芬·格林布拉特在内的很多学者都认为《威尼斯商人》是

一部带有反犹色彩的戏剧。二战期间这部剧甚至被纳粹德国多次公映来彰显犹太民族的劣根性并以此作为大肆屠杀犹太人的依据,从而证明莎翁笔下的犹太人团体自诞生之日起就为人所不耻。当代很多学者通过后殖民主义理论和“他者”理论做切入点,来探究夏洛克在当时社会中的艰难处境。多方位解读人物本无可厚非,且人物形象的多面性也正是莎翁作品四百年来一直被奉为经典的原因之一,但是仅从此处便得出莎翁是一位深受时代思潮影响的偏激反犹主义者这一结论不免有失偏颇。在霍华德看来,“做一个反犹主义者……需要有狭窄的心胸和匮乏的想象力”,莎翁这样一位有着“驰骋想象力”的大师很难是一个狭隘的反犹主义者,“伟大的作家(一般)是不会反犹的”(傅适野,2017)。作为一名擅长将英国的日常生活转化为探讨犹太人在英国处境的幽默小说家,霍华德在作品中注重描写人们在自我身份认同问题上的挣扎,其幽默睿智的文风也常常裹挟着辛辣的讽刺意味,而犹太裔这一层身份让霍华德对夏洛克的经历和遭遇感同身受,也为作品增加了另一层普通作家很难用文字表述的深刻思考。

在采访中,霍华德还提到莎翁笔下的世界(即《威尼斯商人》)缺乏严肃性,剧中的非犹太人全都不那么可爱,而是耽于享乐、好吃懒做、不思进取,他们魂牵梦绕的不外乎金钱而已。这些非犹太人处处排挤犹太人,将其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欲除之而后快。霍华德让莎翁笔下非犹太人的特征在自己的作品中得以延续,而且虚伪浅薄更为甚之。以小说主角犹太人斯特鲁洛维奇与他第一任基督徒妻子奥菲利亚·简以及其女儿比阿特丽斯和球员葛兰顿·豪瑟姆这两对失败的跨民族伴侣关系为例,简是一位激烈的反犹主义者,而葛兰顿则是一个在公共场合举出纳粹手势的风流球员。这两人都声称自己愿意亲近犹太人:简嫁给犹太人斯特鲁洛维奇为妻,是“为了贴近希伯来民族的悲情史,体会那个说拉迪诺语的高贵民族所经历的磨难”(霍华德,2017:12)^①,葛兰顿则对犹太女孩“情有独钟”。在这两对关系中,斯特鲁洛维奇跟第一任妻子将日子过成了地狱,因为简丝毫不能理解他的插科打诨和嬉皮笑脸,或许斯特鲁洛维奇跟简的失败婚姻也为比阿特丽斯跟葛兰顿最终关系的失败埋下了伏笔。同时葛兰顿对犹太艺术无动于衷,甚至不能理解比阿特丽斯所讲的犹太笑话。在这两对夫妻中,双方拥有不同信仰,根本没有共同语言,没有一丝一毫的精神契合。那些声称自己对犹太文化、犹太人爱得深沉的基督徒却对犹太人的生活方式一无所知,暴露出他们心口不一的虚伪。

千百年来,犹太人被塑造成成为社会的边缘群体,主流社会中的“他者”。作为犹太人的典型代表,夏洛克更因为蓄意谋害基督徒之罪而为犹太人添上了洗刷不掉的骂名。霍华德想要为夏洛克正名,便巧妙地以此为切入点为犹太人辩护。乔国强认为,传统的犹太小说中的叙事主题与叙事模式大致分为三类,即与“同化”主题相关的“多元叙事模式”、与“受害者”主题相关的“反讽叙事模式”以及与“大屠杀”主题相关的“创伤叙事模式”(乔国强,2017:59-65)。显然,《夏洛克是我的名字》选用的是与“受害者”主题相关的“反讽叙事模式”,霍华德使用带有黑色幽默色彩的反讽手法,通过莎翁经典之作的戏仿,重构一个新的话语世界。在这个重构的世界中,非犹太人如德·安东、普鲁拉贝尔之流虚伪浅薄而不自知,而夏洛克则被塑造成一个理智冷酷而又洞穿一切的“像魔鬼又像神明”般的人物。霍华德专门为夏洛克设置的“第五幕”是小说的高潮,在这一幕里夏洛克不再如莎翁戏剧结尾时那般噤若寒蝉,而是在以普鲁拉贝尔(鲍西亚)面前言明自己因身为犹太人而受到的责难。他的话语一针见血,锋芒逼人,矛头直指基督徒的无耻:“你先看见了残酷本身,然后给他安了一张犹太面孔”“慈善本就是犹太概念。慈悲也是。只不过,你从我们手里夺走了它们,侵吞了它们。它们本是予取予求的,而你却偏要去偷”“你的无耻,沾满了鲜血”(255-256)。霍华德以凌厉的笔锋赋予夏洛克发声的机会,让其亲自为自己辩护,从而打破人们对夏洛克这一经典人物形象的认识,令读者从另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理解这个被指责了数百年的犹太人。

其次,跟原剧中几条平行交错的情节类似,小说中夏洛克、斯特鲁洛维奇、德·安东、普鲁拉贝尔、比

① 译文选自霍华德·雅各布森的《夏洛克是我的名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出版。下文再引时只注明页码。

阿特丽斯这几个人物叙事视角齐头并进,他们的声音相互独立又彼此共存,最终天衣无缝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这一过程中,作为旁观者、剧情推动者的夏洛克与作为犹太父亲、割礼执行者的主人公斯特鲁洛维奇的主体意识被生动地还原出来。在主体意识表达这一点上,霍华德在小说中建构大量的对话来重现人物的内心,让不同的人物通过话语来表达自己的动机和意识,让读者可以代入特定的情境中,更切身地体会人物的情感变动,比直接的旁白议论更加具有感染力和说服力,其细腻的描写还原了一个立体的、全方位的犹太人夏洛克,也尝试撕掉夏洛克身上原有的性格标签。同时,霍华德对复调叙事的巧妙运用也使得这部作品形散神聚,独树一帜,深刻地剖析人性的双面性。

总之,《夏洛克是我的名字》是对《威尼斯商人》的差异性重构,其目的不在于实现滑稽的效果,更不是为了解甚至全盘否定莎剧,而是旨在借助经典符号的力量创造一个新的话语世界,将人们的目光引向作者想要大家关注的领域里,即再现夏洛克所代表的犹太人少数群体在当代的生存现状。戏仿作为一种叙事修辞手法,将这种发声的实现方式变得更为委婉。霍华德在莎翁的面具下言说,在相对合法合理的话语体系里展开批判,也令人易于接受。通过对莎翁的反讽性戏仿,一方面使莎剧陌生化,让读者从另一个角度理解莎翁,从而促进莎翁作品在当代读者中的接受;另一方面也让霍华德为夏洛克所代表的犹太人这一局外人或社会边缘群体表达自己的合理诉求,发出犹太人自己的有力声音,从而抵抗基督社会的话语霸权,批判当下社会中广泛存在的反犹主义社会现象。

3 《夏洛克是我的名字》对《威尼斯商人》的超越与缺失

无论如何,在互文性空间里,文本总是与某个或者某些前文本交织在一起。无可否认的是,《夏洛克是我的名字》的确脱胎于《威尼斯商人》这一特定的前驱文本,这就使得读者在阅读时自然而然地识别出两者的交织关系,从而不可避免地将两部作品联系起来进行比较。霍华德与莎翁的关系同时也摆脱不了所谓的渊源或影响的干系。根据哈罗德·布鲁姆的理论,先驱莎士比亚的影响,造就了后来者霍华德几乎无法克服的焦虑。霍华德对莎翁有着高度评价:“莎士比亚具有……强有力的想象力,……(他)通过写作来发掘关于人的真理……通过词语发现世界。他的作品始于最纯粹的艺术,并且一直保持着最纯粹的艺术的状态。”(傅适野,2017)在霍华德看来,莎翁是唯一一位能够将写作远离意识形态等那些让文学沦为庸俗政治生活附庸的危险因素的作家,“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将莎士比亚看得过高,而是我们根本没有给予莎士比亚足够高的重视”。他曾表示,对于将莎士比亚剧本进行现代化改写这一挑战感到恐惧,而且对如何将夏洛克安置在自己的小说中手足无措:“我确实是在直接沿用莎士比亚,这又包含两部分,一部分要写对于莎士比亚的阐释,另一部分是接着莎士比亚写下去。我认为莎士比亚是目前所有作家中最伟大的作家,因此我感到恐惧。”(傅适野,2017)

莎翁的不可替代性使得莎剧重写成为一个巨大的赌博,而霍华德无疑是冒着巨大的风险,因为《威尼斯商人》是莎翁争议最大的剧本,但《夏洛克是我的名字》这部作品因为其独特的切入点以及为犹太人这一边缘群体发声而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不小的关注。文本互文性的存在以及《夏洛克是我的名字》在某种程度上对《威尼斯商人》的颠覆证明了霍华德对莎翁经典作品的现代性戏仿具有既否定又肯定、既破坏又捍卫的悖论式双重意义。毫无疑问,莎翁作为世界公认的最伟大的作家,其极具独创性的艺术手法使他超越了那些曾经对他有所影响的先驱作家。那么,既然霍华德的作品博得大众关注且让原作重现光彩,是不是可以说《夏洛克是我的名字》在受《威尼斯商人》影响的同时又超越了《威尼斯商人》呢?或者说霍华德是否如莎翁一般战胜了影响的焦虑并超越了先驱者呢?

传统观点一般将后世的改作品看作原文本的衍生物,是后来的、寄生的、次等的,不具备原创性(Hutcheon, 2006: xii-xiii)。但是在后现代各种理论作用下,改写的性质和作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丹尼尔·费什林和马克·福杰提出改作品“是在效果上能唤起读者对原作的记忆但又不同于原作的新作

品”(Fischlin et al., 2000:4)。哈钦也肯定了当代改写作品的独特性,认为“当代改写表现出强烈的再写性……改写是衍生,却非寄生;它虽属于二次创作,却非二手创作”(Hutcheon, 2006:9)。朱莉·桑德斯也提出在当代文化语境下,“重写,不管是以小说、戏剧、诗歌还是电影的形式,都不可避免地超越模仿,具备了增量性、补充性、即兴创作性和创新性的特征”(Sanders, 2006:12)。基于上述观点和前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夏洛克是我的名字》这部后现代改写之作不仅仅是对莎翁戏剧的阐释和续写,其具有典型的后现代特征以及霍华德独特的犹太叙事风格,是独立的文学创作,具有无可比拟的时代创新性。但不可否认的是,霍华德作为后世作家,在莎翁这一伟大先驱者的阴影中进行创作时,势必会产生一种哈罗德·布鲁姆所言的“影响焦虑”。这种焦虑在促使霍华德借鉴或引用莎翁作品的同时,也在努力抛去刻意为之这一层因素。但是,不管霍华德多么努力,他都没有彻底摆脱莎翁的影响,改写版仍然没有跳脱出《威尼斯商人》的叙事脉络和人物设置。

莎翁在《威尼斯商人》中塑造的人物不论主角配角都有鲜明的特色,随着剧情的发展人物形象不断完善,哪怕是夏洛克也被赋予了温情和柔软,成为一个有人恨但也有人同情的经典角色。与莎翁笔下的人物相比,霍华德作品中的角色在性格塑造上存在较大缺陷。其一,小说中的人物远远不如莎翁笔下的人物鲜活饱满,主要人物夏洛克和斯特鲁洛维奇虽笔墨较多,但是次要人物形象都处于被动地位。正如亚莱克西·萨金特所言,小说聚焦于犹太问题,却把其他人物“置于黑暗中”,将夏洛克塑造成一个闪闪发光的正面人物,但其他人物则不过是“一场闹剧中的二维占位符”(Sargeant, 2016),走个过场而已。其二,小说中的基督徒如德·安东、普鲁拉贝尔、简以及葛兰顿等几乎都被霍华德塑造成毫不掩饰的反犹主义者。这样的人物塑造,虽然具有凸显犹太问题的作用,但是却给读者一种偏激的印象。正如詹姆斯·拉斯顿所言,霍华德将所有外邦人都赋予最肮脏的反犹主义色彩是一种“犹太式的被迫害妄想”(Lasdun, 2016)。相反,小说中的犹太人物形象大多过于正面,夏洛克冷静理智,斯特鲁洛维奇风度翩翩,就算是叛逆的女儿比阿特丽斯最终也因为留恋父亲和犹太文化而回归。这种二元对立的人物塑造未尝不是霍华德作为犹太裔作家自身所存在的局限性所致,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主流基督社会对犹太人更进一步的偏见。其三,霍华德的性别政治让这部作品的光彩大打折扣。小说中充斥着对女性角色的消极态度,仅有的几位非犹太女性都被塑造得形象不佳,包括斯特鲁洛维奇的第一任妻子简和巴纳比的富豪女友普鲁拉贝尔。另外,作者使用较大篇幅对父女关系的探讨也令人诟病。小说不仅没有谴责斯特鲁洛维奇对女儿的严密监控和大打出手,而且竟然给斯特鲁洛维奇对女儿比阿特丽斯畸形暴虐的行为冠上冠冕堂皇的父爱理由,他的每一次跟踪,每一次家庭暴力都似乎师出有名。这些犹太式的偏见以及对女性的家庭暴虐折损了小说的价值。

4 结语

不可否认,《夏洛克是我的名字》确实由莎剧改编而来,两者之间的文本互文比比皆是,这实现了两位作家、两部作品、两种文化语境跨越时空的对话,使读者在原先熟悉的认知背景下实现了陌生化的审美效果。另外霍华德当代犹太主体意识的注入和后现代叙事的巧妙运用使得作品焕发出独特的魅力。尽管霍华德无法彻底摆脱莎翁的影响和自身的局限性所带来的缺陷,但是瑕不掩瑜,其新作为莎翁剧作的解读提供了新的视角。通过戏仿莎剧,霍华德在经典作品之上重建新的话语世界,委婉地表达少数群体的诉求,为犹太民族辩护的话语进行发声,试图用自己的声音抵抗主流社会的话语霸权的努力,这一切使得这部改写之作也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毕竟,在漫长的欧洲历史中,犹太人作为少数派一直处于被主流社会排挤、欺辱和边缘化的状态,能够站在犹太人立场的文学作品更是少之又少。常常自称“犹太裔简·奥斯汀”的霍华德,借助于莎翁《威尼斯商人》的夏洛克,实现了为犹太人发声的政治意图。

参考文献:

- Fischlin, Danie & Mark Fortier. 2000. General Introduction [G]// Danie Fischlin & Mark Fortier, *Adaptations of Shakespeare: A Critical Anthology of Plays from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London: Psychology Press, 1-22.
- Genette, Gärard. 1997. *Palimpsests: Literature in the Second Degree* [M].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Hoare, Liam. Howard Jacobson Meets Shylock [N]. *Moment*, December 5, 2018. <https://www.momentmag.com/22759-2>
- Hutcheon, Linda. 2006. *A Theory of Adaptation* [M].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 Kristeva, Julia. 1986. Word, Dialog and Novel [G]// Toril Moi, *The Kristeva Read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34-61.
- Lasdun, James. Shylock Is My Name—Howard Jackson Takes on Shakespeare's Venetian Money Lender [N/OL]. *The Guardian*, Feb 10, 2016.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6/feb/10/shylock-is-my-name-howard-jacobson-review-retelling-shakespeare-the-merchant-of-venice>
- Miller, Lucasta. *Shylock is My Name* by Howard Jacobson [EB/OL]. *The Guardian*, 21 January, 2016. <www.independent.co.uk/arts-entertainment/books/reviews/shylock-is-my-name-by-howard-jacobson-book-review-a6825566.html>
- Sanders, Julie. 2006. *Adaptations and Appropriation* [M]. London: Routledge.
- Sargeant, Alexi. Shylock Is My Name—A Touch of Woody Allen [EB/OL]. *Common Weal Magazine*. Nov. 30, 2016. <<https://www.commonwealmagazine.org/shylock-my-name>>
- 傅光明. 2014.《威尼斯商人》的“原型”故事[J].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119-123.
- 傅适野. 2017. 专访作家霍华德·雅各布森: 现在的问题不是将莎士比亚看得过高, 而是没给他足够的重视 [EB/OL]. http://k.sina.com.cn/article_6185467955_170aec03301900311m.html
- 霍华德·雅各布森. 2017. 夏洛克是我的名字[M]. 齐艳靖, 译.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乔国强. 2017. 论美国犹太小说的叙事主题与叙事模式[J]. 当代外国文学(3): 59-65.
- 朱莉娅·克里斯蒂娃. 2016. 主体·互文·精神分析: 克里斯蒂娃复旦大学演讲集[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A Contemporary Jewish Figure in Jacobson's *Shylock Is My Name*

TIAN Junwu HOU Lina

Abstract: Four hundred years ago, William Shakespeare left the world a play entitled *The Merchant of Venice* and a classical literary image with the name of Shylock. Four hundred years later, a British Jewish novelist with the name of Howard Jacobson rewrote this play into a contemporary novel entitled *Shylock Is My Name*, in which he presents the Jewish usurer as a major character time travelling back to the contemporary world and explores the present situations of the Jewish people in contemporary Britain. As an adaption of *The Merchant of Venice*, Howard's novel is naturally different from the precursor play in style and content, yet there is obvious intertext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text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formal intertextuality of the two texts, creation of new discourses and "anxiety of influence", this article not only uncovers the complicated intertext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texts, but also reveals Howard's voicing for the Jewish people through the parody of Shakespeare's drama.

Key words: *The Merchant of Venice*; *Shylock Is My Name*; Intertextuality; parody; adaptation; Contemporary Jewish Figure

责任编辑:肖谊